

存在着击破西方线性发展模式的某种契机

(法国) 李比雄 著
陆丁 译

我从赵汀阳教授里收到了一份长达八十页的文件，其中不仅有对西方当今帝国概念的批评，还包括一个强有力的语境分析，对象是那种出现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这种帝国概念相对应的政治语境；此外，这份文件还对“天下”这一中国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和阐释。

他的论文开篇就写道：“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世界。”从这个前提出发，通过借用霍布斯关于混沌的观念来刻画这个主要是由于西方这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而造成的“非世界”，赵汀阳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双重的挑战：

1.通过对“帝国”以及其他（从哲学、历史上来说的）相关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用西方哲学自己的语言对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和概念提出了质疑。

2.认为我们现在事实上正处于人类之大写的历史(Human History)的开端处，而我们当今的任务，就是发明一个尚未到来的、真实的、实在的世界秩序。

同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按照跨文化研究所的互惠知识元方法论，他转向了中国哲学的进路，把这一进路看成灵感的渊源：他选择了“天下”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看成一种（世界秩序的）模式。

于是，在我看来，这里就出现了第三个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与一个中心性的提问相呼应，而且位于跨文化研究所的认识论争论的核心：如何去协调不同的知识、历史以及相关的“语言（和概念）游戏”模式，如何去对待这些不同的模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些模式是与不同的文化语境以及经验关联在一起的。

这就是我（至少是我）接收他的论文的方式：把它看成是一个消息(message)，一个由我们的中国同事传递过来的消息，而它所考察和考验的，也恰恰是我们在跨文化研究所中试图提出和回答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相互之间以一种互惠知识的方式达成一种相互理解；更具体地说，就是在我们这些个体的人类存在者之间，在我们各自的文化中、带着我们各自语言的特性（威廉·冯·洪堡）、在这些语言各自的历史性语境中、在它们各自的时间感和历史中、在它们各自对于历史理解以及政治经验中，作为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人达成一种理解；以及，最后，在我们与人类整体以及世界的整个共同历史的关系中，达成一种理解。

对于我们“西方”这一边来说，这个关于相对时间和相对历史的问题，实际上就等同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能否脱离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正是今日哲学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同时，毫无疑问的，也正是跨文化研究所的互惠知识进路中的主要问题。

那么，如果说，一方面，这种目的论的、线性的历史模式已经（或者人们都认为已经）因为西方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霸权的扩张而延伸至整个世界，而另一方面，西方的霸权，就其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宰制地位而言，又看起来已经属于过去，那么，我们今日的处境又到底为何呢？事实上，在此处境之下，我